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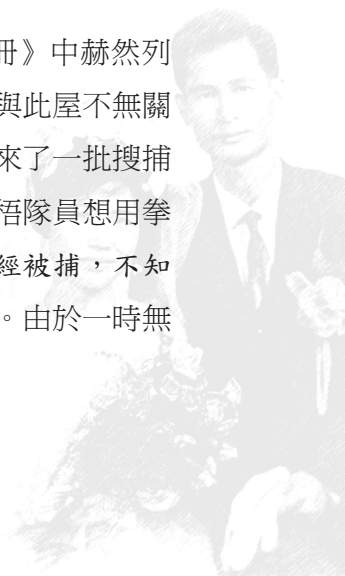
不滅的烙記—— 張大邦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記憶（中下）

文／圖 張大邦

出獄無家可歸的原因

開釋證明上，住所一欄寫的「臺南市開山路12巷29號」其實是大姐的地址，多虧大哥專程從臺南來到監獄帶領我回家。對臺北市，我全不熟，車如流水也不知如何過馬路十字路口，終於到達臺南市民生路4號（是他服務的公司的日式宿舍），在湯德章紀念公園旁邊不遠處。當我十年前被捕時還住在民生路56號，終戰後家父帶大哥從中國上海回來，二姐從臺南縣仁德國小老師宿舍搬回到臺南市一棟日產房子，二樓洋房，面對馬路，做為藥品公會使用，後半棟過中庭為我家住所。當年凡是住日人遺留下來的房子，依規定必須申報，否則違法。家父當年依法報備有案。鄰居侯全成開醫院，窺伺已久，苦無機會占用，經常有其名叫阿狗的男傭人來騷擾，有一次還無緣無故找人把家父打了一頓。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侯全成表態投靠當局，還雇用大卡車運補物資給國軍有功，民間稱呼他為「地下市長」，並仗著臺南市長卓高煊為後盾。當我被捕後，侯全成趁機用一大堆糧食局的麻袋搬入前棟店面，把本來有家父和藥品公會共用的事務所塞滿了。隔了一段日子後又換成一堆舊桌椅，並阻止使用至二樓的共用樓梯，故不得不在後樓再造一座。後來索性又把後半棟中庭用紅磚築牆完全封鎖，使我們一家人無法出入，經由派出所出面，認定妨礙自由才留下一小洞口做為暫時緩衝，爾後勾結委託日產處理委員會非法片面撤消原租約。一而再、再而三地逼我全家搬離住所，本來原居住人合法有優先承購權，也被剝奪了。

由於臺南市藥品組合代表人呂室夜在《紀念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名冊》中赫然列名在內，儘管我被移送到綠島時忽然迎面走過來無機會交談，卻合理懷疑與此屋不無關係。在此段時間還被密告情治單位：「有叛亂分子住在此屋內」，半夜又來了一批搜捕人員叫開門，要查戶口。搜光屋內沒有找到人後，一時惱羞成怒，一名魁梧隊員想用拳頭毆打大哥，被隊長阻止了，還問：「張大邦哪裡去了？」大哥答：「已經被捕，不知去向。」才悄悄回去。此時，侯全成竟以醫師公會名義承購意圖合併占用。由於一時無



法解困，不得不搬遷到三分仔，是大哥服務的臺南製麻會社宿舍。後來因年久失修，被白蟻快吃光成為危險房屋後出售，又搬到民生路4號，於是成為我暫時棲身之所。我在高雄工作於大榮製鋼公司時，工廠東側有縱貫鐵路經過，北邊是從鼓山二路到華安街通到林商號合板廠馬路，鐵路交叉口有一個平交道，沒柵欄也沒人看守。有一天在平交道上發生車禍，正是侯全成的轎車卡在鐵路平交道上突然熄火，以致人車俱毀慘死，成為報紙上頭條消息。侯全成曾接任臺南光華女中董事長，引進中國紅包文化，公款私用，排除不願同流合污異己者，並逼走校長及資深教師離職等惡行劣績，破壞教育界校風；內幕詳述於「林新村著回憶錄，走過一世紀」一書（《政治風波》，頁157-161，高雄：人生書局），這是不是因果報應天譴現世報不得而知呢！¹侯全成威風不可一世時，在中華日報頭版有人以大字登報指其父是海賊。隔兩三天後在同一版面回應說「家父之所為不詳，此事到此為止，不再回應」。這些我被捕後的情形是大哥在最近看到此回憶錄才告訴我，並說：「你受難十年，我苦難十五年！」家母說阿狗與她同是民族教會信徒，臨死時將他一生所做惡行向牧師懺悔，求上帝赦免。附記大哥感言：

人の死なんとするやその声悲し、人の死なんとするやその声正し

（人之將死何奈！其聲悲也。人之將死何奈！其聲正也）

回家後依規定須立即到警局等單位辦報到手續，我的開釋證明背面一一記載著到單位簽到紀錄。從8月16日起一直持續到19日前後四天，每天都到不同單位報到，在不同單位留有詳細記載，數起來一共六個單位，馬不停蹄沒有間斷，才喘了一口氣，向管區趕辦管束手續，密密麻麻，歷歷可尋。面對家境突變、世態丕變，恍如隔世，頓時不知如何是好、前途一片黯淡，獨自走到湯德章紀念公園裡，坐在一張椅子上，腦海一片空白，不知從何處出發，不禁潸然淚下，呆坐良久。而我大哥正找不到我回去吃午餐，終於看到我枯坐在當年湯德章被槍殺的樹下不遠處。

另有一件難忘的事，是有一天在臺南街道上，偶然碰到迎面而來的同學陳從（電氣科，胞弟為大眾電腦公司董事長簡明仁）與我擦肩而過，他不敢停留回頭，突然間喊出一聲日語：「後面有特務在跟蹤喔！」回想起來，還是有這種富有正義感與人情味的同

1 當年日人遺留下來的工廠公司行號和私人房子，一切財產均歸政府設立的日產處理委員會掌管處理，曾由連震東為主管，由他經手成為公營事業及黨產。他由一個公務員成為富翁，其子連戰也成為黨主席。這段故事另有專書記載。

學在。那位同學的父親在日治時代因從事政治活動而不知去向，他告訴我他從母姓，不與父親姓簡，我想其父是否為簡吉？然而他已去世，無從再確認。這個人畢業後一時和我同在一間音樂廳共事，他也是彈樂器。那一家「南樂團」在中正路，主持人是音樂界的名人，也是臺南師範大學的音樂老師——蔡誠弦。

出獄謀生（一）：台糖新營加工廠

我在軍監關了差不多七、八年，一直到1960年才出獄。出去時要宣誓，獄內一切見聞不可外揚，要你保密，還要找兩個連帶保證人，才肯放人。出獄後要找工作。我被捕之前，還在臺南市建設局時，認識一個建築師，姓郭，讀臺北工業學校，因為我也讀建築，就這樣認識了。後來我在軍人監獄和郭振純相遇，他是第一屆臺南市長葉廷珪的選舉幹事，葉廷珪當選，後來不知何故竟也成為白色恐怖受難人。國民黨的候選人黃業落選，郭振純就被抓去判無期徒刑。跟郭振純一聊，才知道他的哥哥就是我認識的那位建築師，他說他哥哥在「台糖新營副產加工廠」當營繕課長，也因為這樣，我出來之後就去找他。他說：「你好運，剛好有一個人去當兵。你先做臨時的，六個月。」進去沒多久，安全室就知道了，六個月一到，就叫郭振純的哥哥親自把我帶出去，不然那裡的宿舍非常美，空氣又好，也有養牛、雞等，還有一些「南農」的學生時常供給蛋和牛奶給我。

另一位張姓府城青年，建築師斯文的外表，溢冒著苦熬十年流放歲月的辛酸氣息，卻不失為當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凜然氣魄，正在指日等待出獄。鄉音悅耳撥動心弦促使兩人愈談愈熟，由盛場²談到夕陽映照的運河。「鱔魚麵、土魷魚羹、魚丸湯使人懷念。判決後也許心定神馳，常常在夢裡垂涎三尺。」張某回憶著。喜愛心理探討的張姓建築師，為解明此謎，一再回味伊所講的：「美與力合一的象徵，在自然界是調和，在人間是妥協的藝術。」執著地探索到底，終於究明兩者之共同點是「肯定不同個體的存在」而求得答案——自主的人格是他與眾不同的特質。³

2 Sacaliba，又名沙卡里巴，府城歷史悠久的飲食市場。

3 郭振純著《耕甘藷園的人》（臺北：玉山社，2008），頁241-242。參見內文。



出獄謀生（二）：大榮鐵工廠

六個月後我又沒工作了。記得李天生曾經向監友誇獎：「張某某這個人很可取」。這風評也是我親耳聽到的，所以我寫信給李天生。他收到信後，就馬上叫我去上班。好在我遇到這個貴人，不然死在路邊也是有可能的。一個從病房出來的臺中人黃榮雄，他和曹開同案，跛腳且近視很深的他，出獄後無依無靠，幸好我沒有那樣淒慘。

沒想到在獄中因緣際會認識李天生，接成大出身的營繕主管的缺，我就因此成為他的得力幹部，在大榮做了差不多二十五年。凡是和大榮有關聯的營繕工作，包括公司員工勞工宿舍四十九戶住屋興建工程，都由我負責專辦；另外例如海外廠房、臺北分公司、大榮重工業、朴子化工廠、高雄新生地的新榮鑄造及大榮重工工廠及投資印尼、泰國及東南亞合資公司鐵工廠廠房的出口、奈及利亞電氣爐廠房、越戰中的簡易鋼造式營房，岡山大豐液氧工廠新建工程等，包括配合所有機械生產設備的土木基礎工程，全都由我一手經辦。我的單位前後十幾個助理工程師，以及帶領一批木工廠工人及流動臨時工人班。李天生的大榮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收留很多難友，凡是可用的人才都收進來。一時呈現落難者如廢物利用回收場樣貌，結果引起特務機關突擊搜查，所有的帳簿資料全部搬光光。本來一天有幾百噸的原料和產品物料進出，生意無法做、帳也無法記。答應人家的貨要交也無法如期出貨，



圖1 1970年筆者在大榮鋼鐵自動軋鐵廠鐵架前留影。（張大邦提供）



圖2 1975年筆者在岡山鎮大豐液氧工業公司建廠完成留影。（張大邦提供）

只好暫停營業。這種搜查前後發生兩次，但李天生沒有被嚇到，他對人家說：「這些人沒地方去，我是替政府在做事情啊，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由此可見李天生畢生做人做事富有愛臺灣的鄉土精神，有公義心，不屈不撓的正義感。發生八七水災後，他以「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胸懷，從低窪處遷村道不怕淹水處重建他的故鄉——天星新村等一百多戶不勝枚舉的義舉；對公司有貢獻的員工，每人給予一尊關公銅像，勉勵員工做人要自強不息、秉持正義；對抗日本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農民組合的昔日同志們，絕不做違背良心的供詞，勇敢面對酷刑、這種人格特質的典範，做為他的晚輩的我，知遇之恩深感有幸矣！

大榮收留的受難者，總共有二十幾個。像劉守鴻，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史》記載，曾是日治時代臺灣共產黨南區負責人。大榮員工也有外省籍的臨時工人，像林光標⁴等就是。褚鴻森⁵的父親褚火生是老董事大股東，可說和老闆是同輩分的。褚鴻森受難友詬病的，是愛打小報告給老闆，存心排斥患難之友。至於黃青松⁶在公司倒閉後患了失智症；梁良齊⁷做到天星煤礦廠的總務課長，後來去了香港。還有兩、三個軍監出獄，掌管出入貨物，員工出入大門的外省人。工廠內關鍵部門，技術人員以外雇用血親人員配置在重點，監守攸關金錢事務。其他有黨工組織人員分布在工廠內，當然不在話下。可見其用人、管理經營能力確實非凡。

李天生先生

高雄大榮鐵工廠的老闆李天生，也坐過國民黨的政治牢，他出獄後用了好幾位出獄的難友，如，涂炳榔、張大邦，褚鴻森、馬再騰、鄭登雲、林淵輝、孫順地，林澄水、黃青松、張滄漢等人。林嘉明與黃嘉祥、孫進汀也短期間在那裡。李天生的企業不僅在高雄，南部其他地方、甚至北部都有；臺北有臺北聯絡處（臺北廠），除了難友的張滄漢在那裡外，張景川也在那裡工作。比一化工廠，有黃振聲與陳耀祖在那裡做事；北部的天星煤礦，梁良齊在那裡工作。在李天生的企業裡工作的難友人數極多，我們難友在

4 據張大邦提供的員工名單，是福建海軍案。

5 董事兼工務課長，雄中畢業，他在軍監裡非常會挑撥，等大家猛衝時，他再退居其後。

6 黃青松，嘉義人，因「臺灣省工委會臺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等案」，被判刑五年。

7 天星煤礦總務課長，臺北中學畢業。



就業上受其很大幫助。因為在那裡工作的難友人數太多，常引起當局的側目，當局常告訴李天生，不要再增加所用人數，並做過幾次的突擊檢查；後來李天生就不敢再增加任用難友人數；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一位難友，因其父親是大榮的股東，他卻很喜歡向李天生讒言，而引起別人的困擾與埋怨。

李天生經營能力強、很會用人，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極關心出獄後難友的就業。在臺灣中南部受惠於他的難友非常多，無人出其右。前後在其企業用過的難友有：劉守鴻（運輸課長，詳參見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史》）、張英南（附註，張行之子，（新榮鑄造公司總經理）、黃青松（財務處長、臺大）、張滄漢（臺北聯絡處（臺北廠）臺大）、陳耀祖（比一化工廠廠長，臺大）、張景川（臺北聯絡



圖3 1966年6月30日，狄克遜艦長上校（右）贈書大榮工業職業學校校長李天生先生（左）。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館藏（登錄號：KH2002.007.370）

處（臺北廠）臺大）、涂炳榔（業務課及總務課長，師大）、張大邦（大榮有關企業營建工程及大榮高工興建工程營繕課長兼大榮高工建築製圖教員，南工）、林澄水（大榮煉鋼課副課長，雄工）、林淵輝（品管化驗課長、雄工）、褚鴻森（董事兼工務課長，雄中）、馬再騰（化驗課長，嘉工）、褚阮進（副料課長）孫順地（新營鑄造工廠會計，雄中）、黃振聲（比一化工廠，會計主任）。鄭登雲（煉鋼工場工員）、林嘉明（煉鋼工場臨時工，成大附工）、黃嘉祥（煉鋼工廠臨時工，南師），孫進丁（煉鋼工廠臨時工，臺大），梁良齊（天星煤礦，總務課長，泰中），林光標（臨時工，福建海軍案）、張坤燦（名古屋航空學校、大榮高工實習主任兼就業輔導主任，二次大戰後，第一架私人飛機降落臺中水湳機場，後任臺灣松山機場的場長，後來被捕，刑期十年）。⁸

8 參看《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頁124-125、陳英泰先生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vingtaichen>《回憶·見證白色恐怖》等著作，及《天星回憶錄》李天生口述，黃志明編著等書。

結婚：從「有路無厝」到「借錢買厝」

我出獄後老闆曾幫我做媒，特意帶我去臺北。臺北女孩子很摩登，我這個南部人看到臺北的漂亮小姐心想：「老闆在和我開玩笑吧？」以前的同班同學看到我時會把臉轉過去，眼色也很不自然，有的還不正眼瞧你，我這個人怎麼能成家過活？女孩子看你是一個特殊人物，既沒有家也沒有經濟基礎，連自己三餐都顧不來，哪還會想結婚成家？但當時幾乎沒有自助餐之類的餐飲，也沒有洗衣店，不成家根本就沒辦法工作生活。因此我的婚姻也是受難的連續曲，無路可走，境遇所迫不得不成家的無奈，沒有所謂的戀愛或不戀愛可言。我在大榮工作時，有一次我回到臺南遇到學長，他小時候曾是我的鄰居，被捕前我在營造廠時曾請他來工地幫忙。他問我：「你有女朋友嗎？」我說：「沒有。」原來他有一個表妹還沒嫁，原本不打算結婚，但學長的太太勸她，還是嫁人比較好。當時我心想，有人要嫁我就好了，就在學長家見面，她頭低低的坐著，聊一聊就OK了。她不知道我是個政治犯，心想是表哥介紹又是同校學弟。於是她嫁了一個丈夫，我娶了一個老婆。婚後，我們生了兩個男孩。但是我婚前的案情，太太和小孩都不知道。派出所每個月查戶口的事我也都不講原由，一直到宣布解除戒嚴時，我還半信半疑。一生帶著這種不幸的陰影過生活，內心懷有恐懼、生活心態不平靜，但為保護妻小，只求不要有意外事情發生。

張妻：「我比較簡單啦。那時我年紀不小了，結婚主要是找一個老伴。我想既然他是表哥介紹的，說是他的朋友，可能沒問題啦，也不知道他是從『那裡』回來的，完全都不知道。」

結婚前我先講明：「妳要幫忙賺錢。因為我沒錢沒勢，進沒步、退沒路、身外無一物，社會也不會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我。」結婚後，她由嘉南水利會轉到大榮高工上班，那時學校剛設立，老闆的大女兒做會計，她做出納。後來老闆蓋一間五樓大廈，是他出獄後就開始建造的。當時鹽埕區還有很多矮房子，從壽山往下看，看到那間聳立的五樓房子，是這一帶最高的樓房。我住在三樓，那是給高級幹部住的：如財務處長、⁹總務課

9 會計主任黃青松失智十多年，人目前還在世，畢業於臺大。



長、¹⁰煉鋼課副課長¹¹等，還有一些成大的人都是李天生的心腹幹部，和老闆住在一起。到待二十多年後，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將來，如果有一日你沒房子、沒工作怎麼辦？」這時我才自覺到要想辦法買一間房子，於是向信用合作社分期付款買房子，就是現在這間房子。果然到了第二年，李天生的兒子留學回來宣布說：「這裡不讓你們住了，我租人家比較划算。」大家就都被他趕出來。好在我前一年就借錢著手買房子。其他幹部措手不及，霎時就落得很狼狽。畢竟父子成長跨越不同時代，受的教育與人生觀皆不同，因此經營理念截然不同，但當年卻沒察覺到這點。



圖4 筆者結婚照。(張大邦提供)

退休：大榮倒閉始末

我在大榮一直做到56歲（1984），做到公司倒閉不得不離開，另找工作。公司怎麼會倒閉呢？是因為大老婆、小老婆分產不均、引起糾紛的緣故；公司因營運需要資金周轉，將大部分的不動產、包括臨海工業區新生地房產占地約一萬八千坪、大華合板廠房等借貸都拿到華南銀行抵押。結果他的子女們爭奪財產，就突然宣告周轉不靈倒閉。話說李天生出身在窮困家庭，他的婚姻聽說是招贅的，兄弟從小就失散各地；起先，他做陶瓷生意賺了錢後，又去中國做生意，請個上海的幫傭煮飯，後來就帶回臺灣。沒想到娶回來卻演變成二房「南國」（高雄）和大房「北國」（臺北）兩家之爭。大榮鋼鐵當時的企業很大，除了臺北廠、天星煤礦、高雄三家工廠和朴子化工廠，東南亞也有分公司再加上大榮高工，事業規模龐大，因此兩家不免有糾紛。本來她們互相背書，後來互相不信任，感情也不太融洽，導致公司突然倒閉。（古諺：「家和萬事興」——臺灣鄭

10 涂炳榔同時擔任業務課及總務課長。

11 煉鋼課副課長為林澄水，雄工畢業。

成功王朝至其二代鄭經，也有嫡庶內部衝突而崩塌，然而臺灣外來移民社會多元族群文化間更多矛盾！追根究底，人被「權」、「錢」拖磨，「權錢」是真相的一體兩面。只有「公義」能超越它，然而何謂公義？口是心非的中國威權文化防線守得住嗎？政治與「金權」遊戲有何不同！？這是題外話。）

起初臺北廠是建在沒有都市計畫的河畔土地上，後來被規劃為都市計畫堤防外，因此借款比較困難。後來互相擔保又出了問題，資金周轉不靈就跳票，公司突然喊倒就倒，究竟原因是什麼也不清楚。不少員工將錢存放在公司裡生息（有的還寄存幾百萬元），最後都不了了之，連員工的遣散費也付不出來。很多被犧牲的員工曾一心以公司為家，公司倒了之後，員工心有不甘，將整個公司占據，輪流看管，等到善後處理好才肯離開。李天生有先見之明，知道事業總是有興有衰，早早就籌設財團法人——大榮高工¹²，買地、開路、校舍興建工程、實習工廠、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公司幾十年來不間斷的擴建工程、以及東南亞華僑合資公司廠房等都由我一手主辦（曾經雇用助理達十多名外，建築申請則請蔡石根建築事務所代辦）。離職後留了一本每年我主辦的營建工程紀錄及工程相片為紀念。當時分配的股票有2,814股59張，成為紙上股東如浮雲來去無



圖5 筆者任大榮高工建築製圖科第二屆老師。
（張大邦提供）

蹤，至今仍留存著，捨不得丟掉。畢竟是我年輕時學會的經驗，有機會發揮值得留念的東西，也是被抹煞的青春年華所留下的美好足跡，當年也曾受聘在大榮高工當建築製圖第二屆學生的老師。他說：「事業會倒，我這個財團法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這個不會倒」。本來建校宗旨為培育工業技術人才的教育事業，大榮倒了後，一手建立起來的事業不幸化為烏有。意想不到，大榮高工後來竟成為李家子弟接代的另一個立足之地。

從茂榮鐵工廠起家演變到大榮公司被沒收、拍賣的命運，員工們為了避免被拍賣後、失去生活依

12 根據〈大榮高工校史〉，網站：<http://www.dystcs.kh.edu.tw/po.htm>。1959年10月成立大榮製鋼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灣省高雄市天星工業職業學校」籌備委員會，1964年更改創校校名為「臺灣省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李天生為首任校長，1982年從大榮高工董事長之職退休，1984年4月20日去世，享年79歲。



圖6 大榮高工第三屆校慶，建築製圖科二年級模範作品。（張大邦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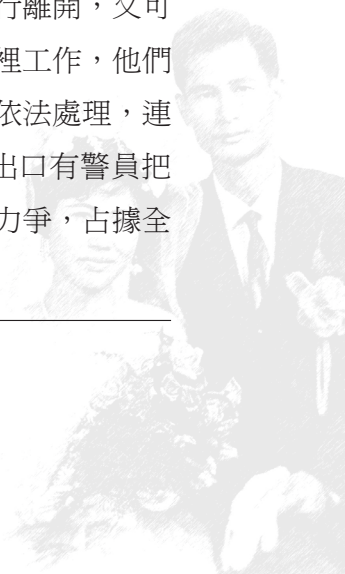
靠，後來由他的家屬和老員工共同籌資，將鐵工廠再買回來。公司尊重李天生被捕之前本來的地位和經營能力，再請他當董事長。後來曾經有人勸他將公司改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但他回來後的股東結構已和之前大有不同，實際上的經營權由他一個人來掌控。因為他還有從監獄帶來的一批人才配置在重要崗位上，他另有考量，所以沒有成為公開上市公司；本來在南臺灣，除了唐榮公司以外，還有大榮公司是併肩競爭的兩大鋼鐵公司，光是高雄本公司規模曾雇用工人達兩千多名，後來只剩下公營的唐榮一家，而大榮就這樣頓然消失，員工更不知究竟流落何處去了；李天生因資匪案被沒收全部財產，後來成立補償基金會時應可以申領被沒收財產，然因家族無法協調代表具狀依法取得補償，令人感到惋惜。

我在大榮時，特務繼續來刁難。那時我住在給六、七位主要幹部住的五層大樓。有一日，從壽山的要塞司令部來了一個少將，給我一張名片，前後找我兩次，叫我寫「報告」。有什麼「報告」好寫的？我工作忙碌一直不理睬，經過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某

日三更半夜，有三個身材魁梧的特務來敲門，撞到門快壞掉我才從睡夢中驚醒前去開門，門一開，手電筒就直接照射眼睛，讓我無法睜開眼睛站著，接著每一間房間都搜，抽屜都翻開，查無所獲悄悄出去，很恐怖！幸好他們那晚來搜查，沒有搜到東西，所以我沒被傳訊，因為陳明忠案¹³當時又搜查逮捕很多人，過沒多久就傳出一些難友二度進宮的消息，凡有被查到寫的東西、有書籍的都難逃一劫。因為陳明忠案抓了一批人，公司也有好幾個被傳訊，包括當時擔任「大榮製鋼股份有限公司」品管課長、雄工畢業的林淵輝，因為陳明忠案被判刑七年；被傳訊的除了涂炳榔，鄭登雲甚至還被傳去臺北問話，或許因為大榮製鋼公司對特務來說是「大窟」，包括日治時代共產黨的主席，裡面有二十多個政治犯，才會來這邊搜查問話，廠內也有國民黨做眼線。而且騷擾還沒結束。前大榮高工的軍事教官當工廠的安全室主任，他的桌子故意排在我的正對面，每天對我說「反共抗俄」，這套八股我在火燒島被灌輸不少，聽得很不耐煩，也不想再聽，我就講佛經給他聽。當時我把佛光山星雲法師在高雄市普賢寺說禪宗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的內容，空有一如的空理給他聽，他變成聽我的，最後也沒辦法逼我走。他擅長毛筆字，因此後來還替我寫「萬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一張字帖給我做紀念，至今還壓在我桌上。

他來騷擾是因為李天生年紀大了，打算退居幕後，準備退休交棒給他留美回國的兒子，故必須調整人事。我們這些老幹部一、二十人，算是他的長輩，跟老闆的關係匪淺，李天生的兒子嫌我們礙手礙腳，要換一批自己的人，所以叫安全室主任用騷擾的方式逼走我們。公司要倒之前，李天生的兒子叫人事室出面，說要找我談條件，我說不用講了，我想說這個工作頂多領勞保給付，你把我斷了至少要依法給個遣散費和勞保給付才合理，他不給我，一時我也無處就業，我又不願無條件離開。同事涂炳榔也被他遣散，因為他父親是醫生、同鄉望族，所以對涂炳榔特意安排到東南亞旅遊一趟，算是特例；在工廠還沒宣布倒閉前，就一直把員工的薪水逐步減少，希望工人自行離開，又可以在將來節省遣散費用。有些公司的工人都待了四、五十年，從小就在這裡工作，他們不肯離開，廠方也拿他們沒辦法。當時已有勞基法，站在資方的立場卻不依法處理，連身為高雄市長的許水德也躲避處理，反而將員工代表趕入地下室，樓梯出口有警員把守，擺出十足威脅姿態。後來，我們工會的員工一致團結，繼續不斷據理力爭，占據全

13 陳明忠案發生於1976年。



部工廠及辦公廳不走，一心想抓住一支稻草，也好做為暫時浮生喘息之用。

工會代表再次去高雄市政府陳情，那時的市長已經換成蘇南成，他比較積極親自出面處理，開協調會議。後來公司終被法院拍賣，由幸福水泥公司以低廉的價格得標，由蘇南成出面和得標人幸福水泥公司協調說：「這些員工很可憐，你們多少也給點意思，要不然公司被員工霸占無法點交資產，也不是辦法」。他說：「這不是我的事情，但我幫你們協商，看看會不會好一些」。幸福水泥公司不得不拿出一筆資遣費來處理善後；由此事件可以看到國民黨政府處理勞工問題的作風，誰是真為人民服務，前後因人而異。（續）